

# 反思“中国模式”研究的 几个问题<sup>\*</sup>

任洁

**【摘要】**目前,关于“中国模式”研究尚有问题需要反思。围绕“中国模式”是否存在,需要回到问题的原点,挖掘“中国模式”的内在独特特质,以确证“中国模式”的存在;围绕“中国模式”研究的兴起,应该依靠中国自己的力量,摆脱“挑战——应战”的被动局面,掌握话语主动权,全面、翔实、深刻地阐释“中国模式”;围绕“中国模式”的历史界限和历史前提,应该将两者进行区分,既清晰说明“中国模式”的基本内涵,又清晰说明“中国模式”形成的历史前提,阐释清楚中国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问题;围绕“中国模式”的普遍性和特殊性问题,应该认识到“中国模式”本身就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结合体,片面强调其特殊性和普遍性必然会对“中国模式”产生误解。

**【关键词】**“中国模式” “挑战——应战” 反思

**【中图分类号】**B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952(2013)05-0037-06

“中国模式”是近年来国内外热议的话题。相关研究围绕中国模式是否存在、中国模式的基本内涵、中国模式的发展趋势、中国模式面临的问题与挑战、中国模式的成功经验与世界意义等重要问题进行了阐述,成果繁多,视角丰富,立场和观点也不尽相同。对既有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归纳、反思,既是深化中国模式研究、深入探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经验的客观需要,也是掌握话语主动权、维护和提升中国形象的战略要求。

## “中国模式”是否存在

“中国模式”最初是外国学者用来指称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成功发展实践的概念。但是关于“中国模式”概念的科学性,“中国模式”概念能否用来概括中国发展的经验,国内学界并未达成共识。不赞成使用“中国模式”概念的学者认为,人类社会发展中不存在某种固定的发展模式,发展经验不等于发展模式;“中国模式说”既不符合中国发展现实,又不符合中国迅速变化的时代

特征;苏联模式及其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影响也证明所谓的模式是有害的;“中国模式说”会引发负面的国际效应;“中国模式说”会掩盖中国社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sup>①</sup>赞成使用“中国模式”概念的学者认为,完全没有必要回避使用“中国模式”这个概念来概括中国的发展道路和发展经验。理由是:“模式”一词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它标志着事物之间隐藏的规律关系,而这些事物并不必然是图像、图案,也可以是数字、抽象的关系甚至思维的方式。就社会发展这个意义而言,“模式”往往指前人积累的经验的抽象和升华;经过60多年的探索和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各个方面已经初步形成了比较定型的体制;我国的领导人和党的文件并没有回避使用“模式”这个概念;“中国模式”概念提供了一种研究中国社会发

<sup>\*</sup> 本文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学者发展基金”的资助。

<sup>①</sup> 丁志刚、刘瑞兰:《“中国模式说”值得商榷》,《学术界》2010年第4期。

展的新视角。<sup>①</sup>

更多学者认为用什么概念总结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成功经验并不重要，他们主张在认定中国模式客观存在的前提下，踏踏实实地对此进行研究，认识它的优缺点并对它进行改进和完善。针对那种因为中国发展中存在问题而批评甚至否定“中国模式”的观点，他们指出“中国模式”是客观存在的，强调“中国模式”仍然处于探索之中就是基于“中国模式”已经基本形成和对其持基本肯定性评价的事实。如果中国能够调整发展方式走可持续之路、解决好社会公正问题、使人们能够真正认同和自觉自愿遵守最基本的政治伦理秩序，那么这条道路不论称之为“中国道路”、“中国实践”，还是叫“中国经验”、“中国模式”，都是不为过的。<sup>②</sup>

目前，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已经超越了要不要使用“中国模式”这一概念的阶段，我们应该也必须发出中国自己的声音，向世界阐明中国发展走过的30多年、60多年、90多年甚至追溯中国发展的历史逻辑，向世人清晰说明中国发展的实质和未来前景。这也是提升中国软实力、提升中国形象的题中应有之义。但是更根本的是要抛开概念争论，回到问题的原点，正面回答“中国模式”是否存在的质疑。换言之，就是要找到支撑“中国模式”成立的内在独特特质，如果能总结出这一特质便能确证“中国模式”的存在，总结不出便很容易使围绕“中国模式”展开的一些研究变成概念游戏。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中国模式是个比较出来的概念，如果我们把某一类国家归纳出什么特点，而这些特点我国没有，同时，我国有一些东西是那些国家都没有的，那大概就是中国模式了。”<sup>③</sup>其实，国际社会关注的正是“中国模式”的独特性，有些学者和政界人士将促进中国持续发展和进步的因素归结为强政府、弱市场、威权主义等等，但是这些因素似乎并非中国独有，甚至与其他模式重合、趋同，所以这些因素或许是中国模式的组成部分，却很难成为中国模式成其为自身的内在理由，依靠这些因素我们依然不能将中国模式与东亚模式或其他什么模式区分开来。

有学者立足世界历史的宏大视野，通过将中国模式与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模式作比较，总结出中国模式的独特性，如黄平研究员认为中国探索了一条不同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内依靠雇佣劳动与剥削、对外侵略扩张、殖民移民的发展道路，而是走出了一条不追随“华盛顿共识”的新型发展道路。这种新型发展道路没有照搬任何现成的模式，这是一个基本的共识。<sup>④</sup>潘维教授指出，中国发展道路的成功之处在于它扭转了中国近代以来积贫积弱、国际地位迅速下滑的趋势，把世界上最大的小农国家变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工业生产基地，使中

华民族步入快速复兴的轨道。而且，中国取得如此的成就没有依赖侵略战争，也不依赖在政治、经济和思想上控制其他国家的人民。<sup>⑤</sup>韩毓海教授在《五百年来的谁著史》一书中指出，日本学者杉原熏（Sugihara Kaoru）通过对中国和欧洲的社会劳动史进行比较分析而作出的东亚“勤劳革命”模式对抗欧美“工业革命”模式的论断，提醒我们注意一个事实：“中国是现代世界上，唯一的一个没有通过剥夺农民的土地而完成了工业化的国家，仅仅这一点，就可以说明‘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并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sup>⑥</sup>

就目前的研究成果而言，以世界历史为宏大视野，立足中国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展现“中国模式”独特性的研究成果还比较少，但这一研究理路无疑最能够挖掘出中国在价值理念和制度设计上的独特东西，从而也最能说明中国模式的存在，最有利于向世界阐明中国模式。

## “中国模式”研究兴起的原因

虽然不能简单认为“中国模式”概念源于雷默的“北京共识”，但的确是“北京共识”的发表拉开了国内外高度关注“中国模式”研究的序幕。我们需要对“中国模式”研究兴起的背景和原因进行认真分析和研究。

总体而言，中国模式被国际社会关注，主要是因为中国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创造了所谓的“中国奇迹”；同时，中国逐步由国际体系外的革命者变为国际体系内的改革者、建设者，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逐步扩大，成为国际格局中不可忽视的一极，引起了西方发达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关注。这种关注随着国际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的爆发一再升温。当美国和欧洲陷入经济危机的泥沼时，中国却似安然度过，并且为世界经济稳定做出了自

① 秦宣：《“中国模式”之概念辨析》，《前线》2010年第2期。

② 吴波：《中国模式与中国问题》，《光明日报》2010年12月14日。

③ 秦晖：《有没有“中国模式”？》，《经济观察报》2010年4月5日。

④ 黄平：《“北京共识”还是“中国经验”？》（前言），参见黄平、崔之元主编《中国与全球化：华盛顿共识还是北京共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7、17页。

⑤ 潘维、玛雅主编《人民共和国六十年与中国模式》，北京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4页。

⑥ 韩毓海：《五百年来的谁著史》，九州出版社2009年版，第165~166页。

己的贡献，尤其是2010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际社会更是将目光投向了这个世界最大的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

可以说，中国模式被关注的直接原因是经济原因，国际社会希望能找到中国保持经济持续高增长的动力所在，希求能够为本国低迷的经济发展注入活力；中国模式被关注还有国际社会全面的政治考量和深层的意识形态忧惧。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中国的国际地位也日益提升，西方国家依照自己的发展逻辑和一贯遵循的“丛林法则”，担心中国的崛起将重蹈西方“国强必霸”的历史覆辙，从而对他们的既得利益构成威胁，挤占他们的发展空间。于是，继“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之后，推出“中国模式论”，棒杀中国不成后意图捧杀中国。“捧杀”战略意图通过有意夸大中国的力量刺激本国人的竞争意识和忧患意识。这也是西方大国尤其是美国惯用的伎俩。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遭受巨大破坏，斯宾格勒名著《西方的没落》出现；20世纪50年代苏联卫星先上天，美国恐慌，“导弹差距”之说盛行；20世纪80年代末日本经济上升，外贸竞争力骄人，“美国衰落论”流行一时；如今的“中国模式说”如出一辙，同样反映了西方大国的危机感。<sup>①</sup>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模式论”是“中国威胁论”的变种，是西方国家与中国进行政治较量的一枚棋子。

比经济、政治因素更深层的是文化意识形态因素。西方国家的学者、媒体和政要不断围绕中国模式做文章，折射出他们对西方模式失灵和中国模式崛起的深层忧惧。<sup>②</sup>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苏之间的冷战及由此形成的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对峙是世界格局的基本特征。当时，世界只存在苏联模式和西方模式两种发展模式，西方模式主要就是美国模式和欧洲模式。根植于选民文化的西方模式，高举所谓自由、民主、平等的旗帜，试图将这些价值观和发展模式“普世”，“华盛顿共识”就是向全世界推行美国发展模式的战略。中国当然也在被普世之列。改革开放之初，美国曾以为中国在不久的将来会加入他们的行列，变成资本主义体系中的一员，然而中国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非但没有变成另外的“他们”，反而探索出一条颇具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形成了“中国模式”。这无疑是对西方发展模式和价值观的挑战。<sup>③</sup>令西方担忧的不仅仅是西方模式的失灵和中国模式的兴起，他们更害怕西方国家自身丧失对西方模式的信心。而事实上，“北京共识”出现在西方国家就已经说明他们试图跳出西方的框架寻求新的发展模式。

深受西方模式之害的发展中国家也普遍关注中国模式，这也是中国模式研究兴起的重要原因之一。过去的

几十年，新自由主义的狂潮让发展中国家经历了经济的衰退、政治的动荡和优秀民族文化传统的削弱，产生了“对外的依赖性和内部的贫富两极分化”两个相互联系的后果。<sup>④</sup>2008年始于美国并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更将拉美、非洲等发展中国家推向衰退边缘。中国在这场危机中的表现及对稳定世界经济的贡献吸引了发展中国家的目光。他们希望能从中国的发展中获取成功的经验，为本国赢回“失去的十年”，获得新的发展启示和有益的发展经验。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中国模式问题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经济原因，也有政治考量和意识形态思维；既有西方发达国家的助推，也有发展中国家的积极参与。需要反思中国在这场方兴未艾的大讨论中所扮演的角色。首先需要指出，尽管中国模式并不是国外学者发明的新概念，但是国际社会热议中国模式却发轫于雷默的“北京共识”。中国关于中国模式发出的声音至少不是自觉的、主动的，还带有浓厚的“挑战——应战”色彩。一方面，这是由于中国文化比较含蓄、内敛、不事张扬，长期以来奉行韬光养晦的战略，“有所作为”强调得不甚充分；另一方面，中国没有专门化、专业化、职业化的智库，致力于解决现实问题和提供政策方案的综合性研究的智库职能主要是由高等学校、党校、社科院、党政机关研究室、军队院校和研究机构“五路大军”来承担的，但是各路大军各有其工作的侧重点和特点，并且在专业知识和技能方面与职业化的智库研究存在差距，即使在亚洲智库中排名第一的中国最大智库——中国社会科学院（据詹姆斯·麦克格恩的研究），也更多地担负着文化遗产、学术研究而非原创性研究的功能，与职业化的现代智库仍有相当距离。<sup>⑤</sup>正如约瑟夫·奈首创“软实力”、“巧实力”概念一样，美国拥有数量众多的智库，这些智库在为国家提供“预选方案”、为国家制定战略策略方面功不可没，所以美国常常能够掌握文化意识形态领域的话语权，而中国在文化意识形态领域却鲜有提出引领世界风向的概念和理论。

<sup>①</sup> 资中筠：《也谈“中国模式”》，参见何迪、鲁利玲编《反思“中国模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80页。

<sup>②</sup> 郑永年：《西方为何惧怕“中国模式”》，《今日时政》2009年第9期（上）。

<sup>③</sup> 郑永年：《国际发展格局中的中国模式》，《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5期。

<sup>④</sup> 卫建林：《发展问题和中国共产党的科学发展观》，《求是》2004年第14期。

<sup>⑤</sup> 参见房宁《中国需要职业化的现代智库》，《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3月5日。

围绕“中国模式”研究，中国的当务之急是立足国际发展格局的大视野和中国自己的历史发展逻辑，好好总结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发展经验，既把中国模式的成功经验阐述清楚，又讲明中国模式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问题；既使相关研究成果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又实现与西方话语和理论交流和对话。如此，关于“中国模式”研究就能发出中国自己的声音，以化解西方对中国模式有意的曲解或无意的误解，为想了解中国却苦于没有途径的国际人士提供全面、翔实、深刻的中国阐释。在阐述中国模式时，究竟是西方还是中国自身的研究更具可信度和说服力的问题上，有学者认为，由于西方学者身在事外，“以他观我”的视角能使研究比较客观公正，加上国外大多数学者能够本着尊重历史、尊重事实的治学精神研究中国问题，所以他们关于中国模式的研究更能得出较为客观的认识和评价。但是，也有学者指出，“由于问题本身的复杂性，加上他们对中国国情缺乏了解和西方媒体的影响，因而有些学者在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涵的分析和把握上，表现出各自的局限性”。<sup>①</sup> 笔者认为，对国外的“中国模式”研究不可一概而论，抽象地评价国外研究成果的客观与否意义不大，要充分吸收借鉴国外研究“中国模式”的相关成果，既充分发挥国外研究置身事外的客观性优势，又努力克服隔靴搔痒、被国家利益遮蔽视野的局限性。“中国模式”研究要立足中国，更多地依靠中国自身的力量，掌握话语主动权，让世界了解中国，维护和提升中国形象。

## “中国模式”的历史界限 和历史前提

在追溯“中国模式”概念的源起时，学界一般都会提及雷默2004年提出的“北京共识”，认为“北京共识”的提出是“中国模式”概念的最早发端。对此，有学者提出，中国模式不是外国人首先提出的概念，邓小平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提出中国模式，强调各国都要独立思考，寻找适合自己实际情况的发展模式。<sup>②</sup> 还有学者认为，中国模式在毛泽东时代就已经初露端倪，只不过当时的主题是革命，所以可以将其定义为革命时代的“中国模式”，以区别于后革命时代的“中国模式”。美国学者詹姆斯·R. 汤森在其初版于20世纪80年代的著作《中国政治》中指出，现今讨论的中国模式“大多产生于毛泽东从50年代中期直到1976年统治了中国的那些政策。这些政策看起来使中国脱离了集权主义模式、苏联模式和各种发展中国家模式，并规定了取代这些模式的毛泽东主义形式的发展模式的主要方面”。<sup>③</sup> 更有学

者将对中国模式的分析置于更宏大的历史视阈中，认为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160多年的历史都可以作为考察中国模式形成的历史背景，如此可以将中国模式界定为：近代以来，拥有庞大人口数量的发展中大国探索如何实现民族解放、摆脱贫困、加快实现现代化、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道路。<sup>④</sup>

显然，关于“中国模式”概念的源起，不能简单追溯到“北京共识”。2004年雷默提出“北京共识”，主要是针对“华盛顿共识”而言的，鉴于中国的发展强大及其国际地位的提升，意在告知世界还存在一种超越“华盛顿共识”的替代性发展模式。可以说“北京共识”的提出使国内外的中国模式研究成为“显学”，然而却不能据此断定“中国模式”始于“北京共识”。至于应该将“中国模式”限定在哪个时间段内，是限定在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还是限定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或是限定在1840年中国进入近代以来，值得思考。这不仅仅是个时间的划定，更牵涉如何认识中国模式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问题。笔者以为，对中国模式明确地做时间上的界定，是为了更好地研究这一模式的特征和内核，但不意味着这一模式横空出世，历史总是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存在于现实中，成为当下的历史前提。如果将中国模式限定在改革开放以来的时间内，虽然能清晰地表明中国模式的正式成型，但是却无法将毛泽东时代社会主义探索的经验和教训涵盖在内；如果将中国模式限定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时间内，虽然能说明中国模式的直接历史来源，却不能区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阶段的不同，从而不易于概括中国模式的特征和内涵；如果将中国模式的时间扩展到整个中国近现代史，虽然更符合中国发展的历史逻辑，使中国模式研究获得“历史合法性”，但是也因为时间太过宽泛使中国模式研究陷于笼统和模糊之中。如此看来，任何一种时间限定都有偏颇之处，对此既要防止武断，又要防止笼统宽泛。

就目前的研究来看，学界倾向于将中国模式界定为对改革开放以来发展经验的总结，相对而言，这符合中国模式成型的时间划分，也最有利于阐述清楚中国模式的内涵和特征，但在研究的过程中应该阐明中国模式与

① 徐觉哉：《国外学者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8年第3期。

② 徐崇温：《对“中国模式”，有四个误解》，《北京日报》2010年4月12日。

③ [美]詹姆斯·R. 汤森、布兰特利·沃马克：《中国政治》，顾速、董方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7~18、254页。

④ 转引自赵剑英、吴波《中国模式的辩证解读》，《博览群书》2011年第4期。

毛泽东时代对社会主义探索的经验教训的历史联系。阿里夫·德里克曾说：“北京共识”或者中国模式中最重要内容，不是中国文化的副产品，而应该是社会主义的遗产，中国国内或国际上有人试图消灭这一遗产。“北京共识”或中国发展模式都能在所谓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那里找到其渊源。<sup>①</sup>德里克实际上指出了中国模式的历史前提问题，也是学界探讨中国模式30多年还是60多年问题的焦点所在。同时，对中国模式的阐述也要结合中国历史自身的发展逻辑和国际格局的发展演变来进行，从而实现中国模式研究的历史与逻辑的内在统一。可见，中国模式决不仅仅是对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发展经验的总结，如果说将中国模式限定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时间段内，是为了更清晰地阐释“中国模式”的基本内涵，那么，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社会主义探索和实践、中国近代历史的抗争却是研究中国模式不可或缺的研究视野，离开这一视野既无法说清楚中国模式的历史前提，也无法向世人昭示中国模式的未来走向。

### “中国模式”的普遍性和特殊性

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是近代以来中国历史的两大主题。但是新中国成立之前的形势是“救亡压倒启蒙”，民族的救亡图存还是压倒一切的时代主题，现代化之路尚未真正开启。只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人民才逐步摆脱了苏联模式的束缚，找到了一条适合自己发展的、逐步成型的发展道路。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在继承前30年社会主义建设成果的基础上，通过总结社会主义探索的经验教训，中国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价值理念和制度设计。这种特殊性便是中国模式成为其自身并与其他模式相区别的本质规定性，这也是围绕中国模式的相关讨论得以展开的根本前提。邓小平曾多次强调这种特殊性，他说：“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sup>②</sup>这种特殊性也就是我们一直强调的“中国式”、“中国特色”、“中国的具体实际”、“自己的道路”。

尽管这种特殊性是中国模式得以成立的内在理由，但是如果以形而上学的思维看待这种特殊性，忽视特殊性与普遍性的辩证关系，则对中国模式的理解则必然会产生误解。概括起来围绕这种特殊性产生的误解主要有两种：一种是过分强调中国模式的特殊性，陷入抽象的

特殊主义情结中，将中国模式理解为绝对特殊的个案，与普遍性毫不相干，这种独特性为中国经验和中国特色，无法效仿和复制，从而也不会为世界社会主义和人类文明贡献很多积极元素；一种是过分强调西方模式的普遍性，陷入抽象的普遍主义情结中，将西方模式视为普适的、唯一的参照模式，而认为中国模式的特殊性是异于西方模式的特殊性，中国模式是放弃了普适性标准的特殊发展模式。

围绕中国模式特殊性产生的误解，根源在于没有辩证理解中国模式的特殊性和普遍性。特殊性无疑是中国模式的题中应有之义，没有特殊性，就没有中国模式，但是任何特殊性不能脱离普遍性而存在，不具有普遍性的特殊性根本不存在。中国模式是特殊性与普遍性的统一体。阿里夫·德里克曾指出：“中国经验提供的不是一个应当遵从的道路，而是一个把普遍性应用于特殊性或把全球性转变为地方性的范例。”<sup>③</sup>可见，中国模式或中国经验本身就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结合体。英国伦敦经济学院亚洲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马丁·雅克曾指出：中国模式实现了“两方面的结合，一方面是向西方和东亚模式学习，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成长的本土资源’（native source of growth），像政策制定，中国是在学习，却是以自己的方式在施行”。他同时指出，现在存在着“现代性竞争”，即不同国家在追求具有不同特征的现代性，“现代性本身是由两个因素形成的，一方面是市场竞争、技术，这些可能趋同的因素，会把不同国家带到相似的发展模式上；另一方面，现代性是由历史、文化所促成的，这些因素在不同国家之间差异很大”。<sup>④</sup>在他看来，趋同与差异构成考察现代性的两个基本维度，而中国模式作为现代性的一种，无疑是在趋同与差异的张力中探寻中国自己的发展道路，这也体现了中国模式特殊性和普遍性的内在统一。

强调中国模式的特殊性不意味着排斥其普遍性意义和价值，具有特殊性的中国模式当然也包含普遍性的意义和价值。邓小平曾说：“现在我们干的是中国几千年来从未干过的事。这场改革不仅影响中国，而且会影响世界。”<sup>⑤</sup>“我们的改革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国际范围内

① [美]阿里夫·德里克：《中国发展道路的反思：不应抛弃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遗产》，远山编译，《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5年第5期。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页。

③ [美]阿里夫·德里克：《“中国模式”理念：一个批判性分析》，朱贵昌译，《国外理论动态》2011年第7期。

④ [英]马丁·雅克：《中国的成功与多元化的现代化模式》，《文汇报》2010年2月8日。

⑤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8页。

也是一种试验,我们相信会成功。如果成功了,可以对世界上的社会主义事业和不发达国家的发展提供某些经验。”<sup>①</sup>

如今西方国家身陷经济停滞、债务危机和政治混乱的囹圄,他们对中国模式的关注除了担心中国的发展强大挑战现存国际体系和西方价值观以外,也希望能从中国模式中得到有益的启示,化解资本主义发展危机。而中国模式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吸引力和魅力,更是因为他们把中国视为自己的“同路人”,把中国模式看做可以替代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的“另类现代性”,能为本国的发展带来经验和活力。如果国际社会

都希望能从中国模式中获得一些有价值的东西,那么这本身就证明中国模式具有普遍性,而不仅仅是中国的模式和中国的经验。

本文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博士  
责任编辑:周勤勤

<sup>①</sup>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5页。

## Reflection on the Research on “China model”

Ren Jie

**Abstract:** At present, there are some issues on the research on “China model” to be reflected. Around whether “China model” exists or not, we need to go back to the origin of the issue, probing into the intrinsic unique characteristic of “China model”, in order to confirm the existence of it. Around the rise of the research on “China model”, we should rely on our own strength, get rid of passive situation of “challenge-taking up the challenge”, as well as master the discourse power in order to give a comprehensive, detailed and profound interpretation of “China model”. Around the historical limits and premise of “China model”, we should distinguish between the historical limits and premise in order to clearly illustrate the basic connotation and historical premise of “China model”, and clarify the issue on where China comes from. Around the universality and particularity of “China model”, we should be aware that “China model” is the combination of universality and particularity. If we place undue emphasis on the particularity or universality, “China model” will be misunderstood.

**Key words:** “China model”; “Challenge-taking up the challenge”; Reflection

## 观点选萃

### 张爱玲小说的身体修辞

张明 郑加菊 杨红旗

西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张明、郑加菊,教授杨红旗认为:张爱玲是一个具有敏锐直觉的作家,其小说被多元解读的基础与底色不仅在于小说人物的边缘性与情节的传奇性,更在于小说强烈的身体性。小说丰富的身体修辞充分调动了读者在视觉、听觉、味觉、触觉上的身体经验,从而赋予小说以极强的感受性,建构了身体修辞新文学传统。

身体修辞与现代性元素的互动下呈现了新的身体修辞特色,中国新文学传统中生成鲁迅凌厉却卑恭的身体,郭沫若狂放且先锋的身体,郁达夫苦闷颓废的身体,冰心纯洁而带有童真的身体……而张爱玲小说话语中的身体生成在都市情愫、性别政治、民间视野与异域经验之中。社会语境、写作身份等隐蔽的成规是身体话语系统生成的重要经验来源。

当战火、革命、救亡失去时代主题的中心位置之时,张爱玲这样日常的、细腻的、处变不惊的小说话语愈发清晰显现入眼。其小说丰富的身体性、很感官的世界以及个性化的身体修辞增强了小说的感受力,并且让读者在阅读的同时通过调动全方位的身体感知去领略小说真正的传奇。有人说,通过张爱玲“有一大群作家找到了通往自身(身体)的道路。”看来说的一点不为过,也说明了张爱玲创作“再度复活已不止一时就不单单只是机运了”。

(马光 摘编)